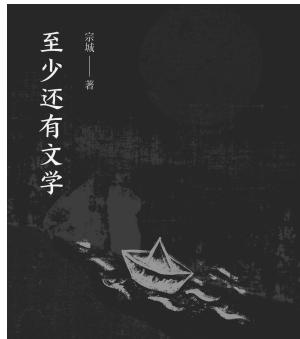


# 文学经典解读的另一种可能

□袁恒雷



北京十月文社出版  
2022年3月  
《至少还有文学》  
宗城著

从本书选取的三十余位作家来讲，以其分量称为经典作家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从作家活跃的时代来讲，主要以上世纪的作家为主，年代最久远的是福楼拜及其《包法利夫人》，也不过一百多年，最近的金爱烂是名韩国80后作家。所以不得不说，本书的视野是足够宽广的。如前所述，这些作家作品的相关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可以称之为显学，他们许多人不仅拥有一众全球性的读者，还是诸多研究者多年追逐的对象。因而，他们的作品自然是经常被解读的。回到宗城的文本，他对这些作家与文本的解读能够生发出新意肯定有其难处——毕竟前面已有诸多解析得很到位的文本出现了，但通读全书后还是会发现，他随笔式的冷静阐述，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恰如经典的一项重要魅力——常读常新，视角依然可以别开生面。

翻到本书目录，一众作家名字可谓灿若群星，福楼拜、契诃夫、卡夫卡、托马斯·哈代、太宰治、鲁迅、钱锺书、张爱玲、汪曾祺、王小波、艾丽丝·门罗等等，都是中外文学史必然书写的对象。除却学院派以各类论文对这些名家名作的各种解读，近些年随笔体解读

经典作家作品也的确有令人眼前一亮作品出现。诸如由丁帆、王尧主编的《大家读大家》系列，邱华栋的《作家中的作家》系列、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等等，都对相当一批已成经典的作家作品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解读。比起这些前辈名家的开拓性书写，宗城作为新一代随笔体解读名家名作的翘楚，《至少还有文学》的诸多文本确实提供了文学经典解读的另一种可能。

首先以福楼拜享誉世界的名著《包法利夫人》为例。通读该文可以发现，宗城对笔者提到的《大家读大家》系列等近年随笔体解读显然是关注到了，他在行文中向这个系列中影响巨大的毕飞宇《小说课》表示了致敬——在我看来，引用别人作品显然是对其观点最好的致敬与认可。《包法利夫人》作为福楼拜最杰出的作品，影响了一代代中外作家。近年，不光毕飞宇对其实行文解读，格非等作家也对其足够厚爱，纷纷撰文进行解读。也就是说，宗城笔下想要写出新意，必然要绕开这些前辈的解读。好在，宗城确实凭借其坐冷板凳的苦功写出了新意——我们会发现，宗城常常在解读这些名篇前进行重新阅读，诸如“我最近又重看了《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等等，这种老老实实的写作语句常常不由自主地蹦跳出来。常读常新用在宗城身上，显然合适，他有发言权。那么，宗城除却陈述出包法利夫人爱玛众所皆知的出轨原因、过程、结果之外，生发出哪些独特的发现了呢？在我看来，主要有两点：第一，宗城发现了福楼拜比一般小说家高明的地方，“他写爱玛的欲望，但不把她写成一个荡妇，真正让爱玛立起来的几笔，不是她和罗多尔夫、莱昂等人偷情的香艳情节，而是福楼拜写出爱玛‘拒绝’的那几笔。”显然，如果福楼拜只是停留在围绕爱玛偷情的来龙去脉书写，这部作品必然会沦为二三流的香艳小说，不可能成为经典名著。福楼拜对爱玛的感情显然是复杂的，即便写其出轨，也是有原则、有节制、有善恶标准的。宗城将其评述为“《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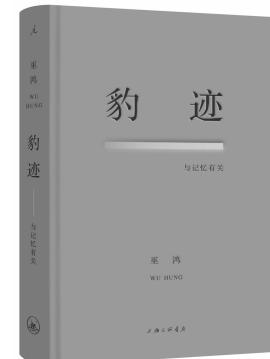
法利夫人》区别于一般偷情小说的关键原因。”第二，宗城也敏锐地发现了福楼拜对夏尔·包法利的隐形尊敬，那是通过原著结尾当地村民与当局对包法利医生的认可体现出来的，这显然又是文本细读的功夫。

其次，我还想谈谈宗城对契诃夫经典作品的新意解读。实际上，契诃夫一篇符合本文论及的三大维度的各个方面，既是一篇言简意赅的作家作品评传，文中又多处运用对比论证，深入作家精神世界后，生发出对原著的理解又耳目一新。契诃夫身为世界三大短篇巨匠之一，对他的研读自然是名家辈出。俄罗斯文学对我国文坛的影响又是众所皆知的巨大，在阅读宗城版之前，笔者较为推崇的是俄罗斯文学专家刘文飞对一众俄罗斯文学名家的解读。其中，刘文飞解读契诃夫的巨大优势在于，他多年来不仅在文本中追逐契诃夫的脚步，更是沿着契诃夫当年的行程轨迹实地踏访，这种阅读与行走的结合，自然令人推崇备至。在此，我不想比较刘文飞和宗城解读孰优孰劣，因为很明显，他们必然是各有所长的，令人欣喜的是，两位作者对契诃夫拥有惊人的一致性，比如他们都认为契诃夫“挤掉奴性”的写作吁求是他创作之现代意义的最重要内涵之一，宗城干脆将其列为该文的篇名《写作是一点一点挤掉奴性》。他们都读出了契诃夫的善良和宽容，和他一如既往的平等意识，寻找出契诃夫经典意义的所在。而且，据笔者采访宗城得知，宗城是在2021年才开始读到刘文飞相关著作的，而他自己解读契诃夫的文章写成于2018年，于此，更显出英雄所见略同的可贵。

综上，宗城对文学名家们的解读依然在进行着。他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解读意义是多重的，但一定会包括其中的，就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导读意义，为新老读者走进文学经典殿堂提供了全新的路径。当文学从千余年前发展到今天，特别是你我置身其中后，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热爱，文学就不会离开，文学本就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

## 写回忆录的巫鸿

□林颐



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  
巫鸿著  
2022年6月

巫鸿是当代最好的艺术史家之一。他深刻又平易，广博又精练，没有学院派惯有的高傲和凛然。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从他那里获得的启发很大，我私心里视他为我的导师。

我读过巫鸿很多艺术史论著。这一次，有点不同，这本书的阅读对象是巫鸿及其记忆。我终于可以把作品与作家的生活做一些对应而更好地去理解巫鸿了。

这部书不是完整的线性的回忆录，而是一些回忆文章的结集，侧重于早年生活和求学经历。平心而论，这部集子写得、编得都松散，没关系，一窥蹊径就足够了。这不是规整的学术论集，它呈现的是一个人、一位有成就的学者的岁月留痕。随手翻阅，放松地，听他说说过去。写人，叙事，论学，诉情。

巫鸿1945年出生于四川乐山，在北京长大，父亲是经济学家，母亲是文艺工作者，家庭环境给他良好的熏陶，父母亲的潜移默化打下了他的基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家受到了一些冲击，巫鸿约略地提了提这段过去，可想而知。巫鸿主要侧重讲了自己的阅读史。从前，家里有很多藏书，父亲的经济学社会学著作，母亲的文学文艺类书籍，他生长于书香氛围，后来，图书的缺乏并没有让他感到困难，反而由于书籍稀少而珍惜雀跃，唤起一种自发的细读，重复地读、逐字逐句地读。巫鸿陈列的书目中大多是《约翰·克里斯朵夫》《红楼梦》《艺术哲学》等经典文学，他也热爱诸子百家、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还有《儒林外史》，它们把他引向了文学与艺术的广阔领域。到了后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笑傲江湖》等金庸作品、罗兰·巴特和苏珊·桑塔格也成了他的座上客，巫鸿的阅读界限不断扩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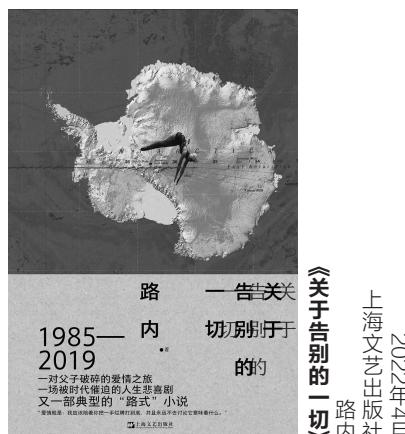
巫鸿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后留美任教。文艺家木心、恩师张光直、挚友杨新、忘年交丁树生、俞伟超、费慰梅……巫鸿写下与他们有关的记忆，书写共同的学术追求和人格信仰。他揭示木心的“隐身”美学，木心长期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豹迹》的序言与结尾都围绕着木心的记忆，这表现了巫鸿对木心的致敬。他畅谈张光直学术方法的影响，张先生是巫鸿在哈佛时的主要导师，巫鸿认为自己从张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学科的认同更为深刻，牵涉到何为文学、何为学者等根本问题。巫鸿还讲述了与友人交往桩桩件件细微而又让他铭记在心的小事。

往事汇成回忆，虽然记忆未必牢靠，而回忆总是藏在心底。记忆塑造了个人的、国家的历史。巫鸿的工作会遇到一些重大事件。中国文物有许多流落国外，围绕国宝《越王勾践剑》的抢救过程，让我们看到了文物保护的艰难。文物为何珍贵？因为它们沉淀着大历史、大文化的记忆，必须为抢救这份记忆而努力。

书名《豹迹》，取自同名文章，放在文集首篇。巫鸿讲述早年遇见克孜尔石窟壁画飞天像的悸动心境。似真亦幻，遐想浮翩，这种文学随笔式写作表明了巫鸿“与记忆有关”的思考，并以此与木心的回忆录区别开来，巫鸿不打算像木心那样超越个人的存在，他承认记忆的可流动性并且接纳更为自由和开放的记忆写作。

“以现下的我召唤过去的我，在复述之中提炼出叙事、形象、线条和色彩。”这是巫鸿写作该书的宗旨。

# 又一部典型的“路式”小说



在李白十岁那年去往深圳，从此音信全无，留下李家父子做了一对弃子。此后李白经历一长串的恋爱、告别与重逢，忽至中年，发现父亲已成了阿尔兹海默病初期患者。

母亲白淑珍不告而别的一幕，构成了整部小说关于“告别”的“元叙事”。相似的关系模式，此后在李白与众多女性的情感纠缠中一再重复。与初恋、爱人、情人、冤家、近邻告别，与父亲共同拥有的记忆告别。李白执着于好好履行每一次完整的告别，像要弥补母亲造成的缺损；但每一次告别又都像是对童年创伤残忍的重温。这透露出李白性格里的隐隐的自虐倾向，“分离—怀恋—重逢—叙旧”的循环重奏，令他痛苦且沉醉，自恋也自弃。路内要写一个时代与命运让人和人不断失散的年代，而“告别”是打开那个年代的一把密钥。

如果自虐式的疗伤是“告别”的精神内面，那么，在外部历史的层面，“告别”继续通向国营工厂解体后留下的历史症结。不同于“追随三部曲”，《关于告别的一切》里，路内只一心一意地用文字雕刻一座厂区浴室的命运。叙事者用肃穆、富有宗教感的声音，描述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国营工厂的集体浴室，李白与玩伴冯江，曾在何处度过难得的欢乐时光。崭新的瓷砖，午后明亮的白色光线，热腾腾蒸汽弥漫，略显奢华的拱顶设计超出了人们对工人阶级的想象——但那确是被后来泛滥的复古影像所遮蔽的一种历史真实。对于来自著名的荒谬之家，从来不受人待见的李白而言，反倒是在厂区，在与工人身体的赤裸相对中，感受到了难得的尊严、仁慈、平等与包容：“对他们来说，工厂才是象牙塔，在获得尊严感的同时，你也会铭记那种美学：粗劣、简明、节省，肮脏与整洁交错，远方哄哄作响，像公路片的场景，无数成年男女在此终老的必然结局，以及某个安静的下午让李白体会

到些微荒凉与忧伤的质地。曾经的年代，全中国的国营企业都近似，一种从寒带到亚热带城市的共同情绪。”

浴池当然是象征，热气散尽，人们身心透凉。“一种从寒带到亚热带城市的共同情绪”的平坦想象、集体温情也烟消云散。中国此后也分化为北方、南方、南方的更南方……而那个“南方”究竟是什么？在《关于告别的一切》里，这个方位，指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珠江三角洲的新兴城市及更南端，如同磁极一般，以“南方”之名诱惑着吴里的人。然而，吴里本就在南方，那片南海边率先起飞的经济神话发源地，繁华温柔异乡，更确切地应该叫“南方的南方”。隔开两个“南方”的，不仅是空间地理纬度，更是中国不同区域与现代化竞速的时间差。

路内的少年轻狂，一步步演化为中年的幽愤、不甘与虚无。当太子巷终于被改造成网红打卡的复古商业街，飘满举着拍摄机器的异装少女。在这个充满历史必然与历史荒谬的场景里，李白与老友故地重游，如同置身幻境的白头宫女，只能闲坐说说往事。他们频频扭头向后的怀旧里，有逃避与自保，溃败之姿式，也有困惑之问：前方究竟还有没有更好的路可走？

回头去看，《关于告别的一切》中写得最好的，或许仍是青少年李白的段落，路内依然是再现国营工厂“光晕”最出色的写作者。青春欲念浮动于屈辱的长夜里，困窘的成长与国营工厂临终前的好时光相遇。终极承诺一片片坍圮，李白做好了诀别后永不重逢的准备，也彻底地不再计划未来。然而，敏感如预言的诸多伏笔，早已经深埋在小说家最熟悉、也最迷恋的八九十年代里。那时关于告别的一切，经由新世纪之手的揉搓变形，也将有可能成为关于一切的重逢。尽管被撕裂的，未必需要被缝合，也未必能够被缝合。

《关于告别的一切》是路内的第八个长篇小说。时间扩容至1985到2019年间，世界在外面天翻地覆，李白在苏州小城吴里从少年到中年，仿佛走过一趟原地不动的感伤长旅。这种应对历史的特殊姿态，用小说里的话说，近乎“一种终极的呆立”。

李白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吴里的太子巷长大。他有过多个为人知晓的身份，“李乌龟的儿子”、农机厂子弟、亲眼见过狮子吃人的人、风流的不婚主义者、过气的中年作家。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里，这些身份有的曾让他蒙羞，有的则平添了他身上的传奇和神秘。李白与诗仙同名，实则不过分别取了父亲李忠诚和母亲白淑珍的姓氏。这种原本寓意“爱的结晶”的中式语法，随着父母婚姻崩溃，变成了伴随李白一生的撕裂感与反讽底色。李白一家三口，是典型的精神分析式的关系，与人私奔的美丽母亲，暴虐又无能的父亲，儿子在街谈巷议的嘲笑声里长大。白淑珍